

中国历代十八高僧

宗教文化出版社

9.92

中国历代十八高僧

张培军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中国历代十八高僧

编著 张培军

责任编辑 郭雪波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787×1092 毫米 1/32 4.625 印张 125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48-1527-6/G·445 定价：3.90 元

前 言

众所周知，佛教诞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随着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演变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中国佛教。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原有文化融合外来文化最为成功的一例，但这种融合，并不是简单的一方吞并一方，而是在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时光里，以儒、道二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将来自异域的佛教改造成为中国佛教，与此同时，佛教亦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生的文化。拿儒、道二家来说，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无疑为重视现实人生，而且孔圣对宗教历来抱“敬鬼神而远之”、“未知事人，焉知事鬼”的实用主义态度。道家老、庄不同。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实际在讲政治权谋之本。既使逃遁于世外，做精神上的逍遥游的庄子，亦极为珍视自然生命。但佛教却不同。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其本质是极端厌世的。只要生——无论在六道轮回中投生为什么——就是苦，故它追求不生（涅槃），对现实世界和生命持否定态度（四大皆空），因此，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矛盾。但中国传统文化却最终以自己强大的内凝力改变了它。佛教中国化，走了一个正、反、合的圆圈。初入中土，它以道术之种的面目出现，打着祈求长生、为人治病的幌子拉拢信众。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和是低层次的、直观的。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译出的典籍多了，它与中国文化的固有矛盾也就暴露了出来，故有历史上多次的佛、道之争，有统治者数次的灭法，但佛教的“本来面目”却比第一阶段清晰得多，这是对第一阶段的否定。第三阶段则为中国佛教的成熟阶段，隋唐时代天台、禅、华严、法相等纷纷开宗立派为其标志。诸派中最具代表意义、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禅宗。以六祖慧能为创始人的南系顿教，讲“担

水砍柴”，要僧侣们不离日常劳做，在平素的生活、劳动中领悟佛道，以顿悟中提升人生境界，从而使佛教也带有了重视现实人生的色彩，这实在是佛教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举，至此，佛教在某一层面上与中国传统的现实理性精神取得了统一，从而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转变。

另一方面，佛教亦给予中国原有文化极大的补充。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便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辩哲学，那亦是佛教的鼎盛期之一。佛教参与玄学争论，用玄学思想解释佛教文理，用佛教哲学注释玄学概念，致使时尚皆以为之，名士若不懂些佛学，不为真名士；道人（佛僧）若不谈玄，亦不能称为得道高僧。魏晋玄学对中国哲学思想向纵深化发展影响颇深，而佛教对玄学广泛、深入的讨论不能说不无裨益。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其唯心主义宗教哲学能达到今天的精、深、更要偏劳于佛教。宋明理学，心学则为中国传统思想之集大成者，它以儒为主，兼容释、道二家，以后一直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历数朝更迭而不衰。

此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许多人都有颇深的佛学修养，如周敦颐、王阳明等等，他们亦将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于其理论当中，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

任何宗教，都包括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部分，其影响与作用亦往往不同。由于中国百姓对宗教历来抱实用主义态度，故简易、实用、速成最受欢迎。至于佛教那些深奥的文理，繁晦的思辩与锋锐的禅机，一般下层百姓是不大领会的。但恰恰这些却深受文人士大夫的欢迎。然而他们往往并不将之作为纯粹的宗教信仰加以摹拜、崇信，而更多的是将其当做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与个体人格的提升。正因为如此，东方式的智慧没有造成宗教的迷狂，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思想文化艺术领域。至于在民间流行的，实际上大多为佛、道、神鬼迷信等的混合物。

但佛教毕竟是一种宗教，它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任何宗教都把希望放在来世、天国、彼岸，要人们放弃为现实生存而做的斗争。佛教更肯定现实的苦难，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辩护。因此，对统治者来说，它不啻是麻痹人民意志的“鸦片烟”，是驾驭百姓的工具之一。这

也是历代君主大多兴佛的原因。

佛教称佛、法、僧为其三宝。的确，僧侣的活动与思想，关于其兴衰存亡。本书介绍的这十八位高僧，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十八座里程碑。通过了解他们的生平与思想，我们就可以粗略地勾勒出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大致轮廓。这对我们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无裨益的。这也正是我们出版此书的本意。

为了便于读者对本书做一个总体的把握，最后再简略地介绍一下这十八位高僧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所处的时空位置及历史地位。

▲东汉，佛教刚传入中国不久，传教以译经为生。（安士高是最早传布小乘佛法的译者；）

▲魏晋，玄学流行，以道安为首的“六家七宗”通过参与玄学争论，提高了佛学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慧远对提高佛教的政治地位做出了较大贡献；此时亦是佛教的第一个译经高潮，鸠摩罗什组织译场并亲自译经，被誉为四大译经家之一，所译典籍最多、最好；为求“真本”、“原旨”，有僧人不远万里西行求法，最著名的是法显。

▲隋唐，是佛教开宗立派时期。慧能创南禅宗，菩提达摩被推为禅宗初祖；法藏创华严宗；智顓创天台宗；吉藏创三论宗；善无畏创密宗；玄奘创法相宗；道宣创南山律宗；怀海创禅宗之洪州宗；

此时为佛教的第二个译经高潮期，西行求法及译者中最负盛名的是玄奘，他亦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

隋唐科学昌明，有著名僧侣科学家一行。

此时中外文化交流频繁，鉴真七次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律宗初祖。

▲近代，内忧外患，爱国成为时代主题。最著名的两位爱国高僧是敬安和弘一。

安世高

(约二世纪)

安世高，原是安息国的王太子，后出家为僧，博学经藏。公元一四八年来到中国，译经三十四部共四十卷，传播“毗昙”学说和修禅的理论，是最早有系统地翻译小乘经籍，介绍小乘教义的传播者。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也是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奠基人。

他本名姓清，父亲是安息国的国王，他是安息国王太子。从小就聪明好学，喜欢动脑筋，善于提问题，得到王室的宠爱。一日，父王兴起，带上一队侍卫，携带上安世高踏上打猎的路途。此时，天色微明，一群大雁在空中排成队列，飞翔而过。安世高驻步凝望，自言自语说：“雁能高宏自由飞翔，我身虽贵，却还不如这飞雁。真想离开这宫墙，随这雁群，到那无极的世界去周游。”父王听后，既感到高兴又感到不安，于是训诫道：“雁虽高飞，却无宏志，你为太子，当为国之君主，怎么可以只羡慕雁的远飞，不思量其身重任。”安世高听后，神色暗然，口中虽然应诺，心却牵挂外面的世界。后来父王离世，临终前将国王位置遗命给他，但安世高却厌恶这些王位争逐，“深悟苦空，厌离名器”，而且他信仰佛教，遂定献身“我佛”的决心，于是将王位让给了叔叔，离开深院过隐居生活去了。即使采取避世态度，也难逃世间的纷争。还没过上几年的清闲日子，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遭到陷害和搜捕，他被迫外逃，出家修道，开始四方寻游，参学诸经，尤其是对《阿毗昙》（是梵语的音译。意译为对比、无比法、胜法、也译为论，是对《阿含经》的论述）产生浓厚兴趣，深学精研，同时还修习禅定，

游学弘化西域各地，造诣日深。当时已有一些佛教僧人为传弘法，不辞艰辛，千里苦行来到汉地传化。安世高遂决心到汉地来传弘《阿毗昙》和禅教。于汉桓帝建和初年（147年）辗转来到中国洛阳。由于他生性聪颖，来到中国生活了三年左右，便能熟练对话，通晓华语，开始参加一些佛经翻译工作。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相当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一些信徒。他们主要是奉行祭祀，祈求佛给予福德，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情况。但也有一些切实修行要求。安世高为了能帮助这些持修行态度的人能入门，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由此受到修行者的推崇，经常有这些人到他的居住室拜访，求经问义者，络绎不绝。有次，一修行者挎着瓜，提着蛋，去向安世高求经问修，进门后，先呈上带来所物，说明来意，安世高坐而不答，默默将一卷经文交于来者，修持人甚为高兴，接过经卷后，边拜三下，高兴的往家赶。到家后，忙打开经卷准备细读，谁知经卷展开，不见一文，顿时恼火，思忖着，送礼相求，却空无一文，岂不戏弄于人。当即，赶去责问安世高，未进室门，就见自己送瓜时用的篮子，空着放在门前，往里一瞧，只见安世高坐在案前，手捧经文，轻声诵读。修行者见状，进不行，退不行，正不知所措时，就听安世高说道：“修行之人，必先脱俗，持诵之人，必理予人。你清我净，方得正果。修持人一听，猛然醒悟，高声叫道：“谢师指点。”掉转身，高兴地离去。还有一次，一修持者跌跌碰碰来到安世高的居处。一句话未完，就跌坐在地，安世高见状，忙送茶问由，原来这位修持者以为：要修持就是断食人间烟火，心念佛祖，闭目合掌。但三天下来，滴水未进，实在是饥渴难忍，难以修持下去了，于是向安世高请教修持的捷径，如何才能进佛界，而不受这般罪。安世高听后问道：“修持成佛是以心为净，身不存，岂可修持？”修持者听罢，豁然开悟，连忙爬起来，跑到市井上填肚子去了。

安世高译经，大概到灵帝建宁中（170年左右）为止。这以后，他就开始了四方参游的生涯。他游历了江南的豫章、浔阳、会稽等地，“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仗锡江南”。（《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他

晚年的踪迹不详，据说，当他转游到会稽时，在市中被一群斗殴者误中身亡。就这样结束了一生，他在中土活动了近四十年左右。

安世高译出的书，因为当时没有记载，确实部数已不可考。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列举所见过的安世高译本，才加以录著，共有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后历经散失，现存二十二部、二十六卷。他的代表译作是《阴持入经》和《安般守意经》。从佛经的目录看，首先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的经籍，属于佛教小乘体系。“小乘”一词，系佛教“大乘”兴起之后对于早期佛教学说流派的一种贬称。早期的佛教经籍，主要保存在《四阿含》中，（它们是《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大半是从《四阿含》中摘抄出来的。除去《四十二章经》及其它已经失译的经籍，最早有系统地翻译小乘经籍，介绍小乘思想的是安世高。

印度佛祖释迦死后，佛教学派不断发生分化，在印度本土上，小乘也分为“十八部”（也有记载分为二十部的）。安世高所译的佛籍和所传的思想，是“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僧传在讲到安世高佛学的特点时，说他“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这说是说，安世高首先传入中国的佛教义理，是小乘的《阿毗昙》和“禅”，简称“禅数”之学，并且是用说一切有部的说法作解释的。所谓“禅数”或叫“定慧”或叫“止观”被佛教认为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修习方法，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佛教所规定的宗教实践。按照指定的观察思维程序，以形成适合于宗教修行的独特心理和幻觉，最后达到符合佛教教义的理论。有时因为侧重点的不同，“禅法”侧重在坐禅的行为，《阿毗昙》侧重在小乘佛教的理论。安世高所译传学则是放在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上。也就是后来道安所说的，安世高善长于阐明“定学”（禅法）、“慧学”（数法），而他所译的也是对于禅、数最为完备。安世高的门徒很多，影响很大的有南阳的韩林、颍川的皮业、会稽的陈慧；三国时的僧人康僧会曾从他们随学，共同注解过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到东晋的名僧道安，在大乘教“般若”风靡当时的情况下，还大力宣扬安世高的禅法，为他所译的大小《十二门》、

《安般守意》、《阴持入》、《人本欲生》《九十八结》等经作序、作注、作解，从而给另一个名僧慧远以很大的影响。

安世高译的《阴持入经》属于阿毗昙小乘体系，其中着重分析的“阴”、“持”、“入”，是小乘佛教中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他们的宗教修持途径。“阴”，后译为“蕴”，其中又分为色、受、想、行、识五类，故各“五阴”，“入”，后译为“处”，指“眼、耳、鼻、舌、身、意等”，被总称为“十二处”。“持”，后译为“界”即在这“十二处”的基础上，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六种内容，构成为“十八界”。所谓“阴”、“持”、“入”，也就是被以后佛教列为“三科”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简称。《阴持入经》称之为“三部并行”，要求从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观察“人”及其生活的这个世界。《阴持入经》把“人”抽象化为“五阴”，佛教说“五阴”和合就是“人”。“色”属于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属于精神现象，所以人就是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统一，身与心的统一。从小乘佛教的哲学理论说，分析“阴、持、入”，是为了导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至此，为了断灭一切世间，也要断灭“阴、持、入”。这也叫做“解脱”，即从世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想得到“解脱”，就要提倡一切“净法”，而“九绝”，是被视为能够产生和促成佛教提倡的一切“净法”的原因，指“一止、二观、三不贪、四不恚、五不痴、六非常、七苦、八非身、九不净。”《阴持入经》的注者说：“得止观行，不贪世间爱欲，无瞋恚痴愚之心，觉知非常、苦、空、非身不净之谛也。”在这里，“止观”就是根本的修习方法，这也是安世高学说的特征。他所倡导的“禅数”之学，就是这里讲的“止观”，他所用的对治的重点，则是“痴”、“爱”，“为一切天下人有二病。何等为二？一为痴，二为爱”；是“二病故，佛现二药。何等为二？一为止，二为观。若用二药，为医二病，令自证。”《阴持入经》的注者说：“止灭爱，观灭痴；痴（爱）灭，得到之证。止观道满，痴爱即灭；饱于道者，不复贪矣。”意思是说，“止”通过意志的作用，就可能使人从贪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观”通过智慧的作用，就可以从痴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这时，安世高把“止观”对治“痴、

爱”的方法，最后又集中到“慧”的一途来。佛教小乘列“戒定慧”为三学，“慧”为三学的中心，在修道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佛教要求人们用“慧”去断“痴”驱“爱”。这些集中地表现了安世高所传重视“持戒”的特点。如果达到“戒已立，定已定，慧已得解脱，已成解脱慧”，这就完成了《阴持入经》中所要求的全部任务，修行者就可成为“佛弟子行者”。这就是小乘佛教中所尊崇的圣贤，从事佛教修习者所追求的目标。

总之，它是以要求严格控制意识的活动，务使按照佛教规定的思维方法以达到控制意志的保证。安世高认为能够发挥“制意最大作用的，无过乎“禅定”，所以“禅定”也成了安世高学派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中国佛教史上，通常把“禅”与“定”并称）而《安般守意经》重点在“止观”中，更偏重于“止”的方面，所以“禅定”的意味更多一些。

安世高的汉译佛典，可算是一种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内容说，他很纯粹地译述出传所专精的一切。有目的从大部《阿含经》中选择一些经典，这些都是和止观法门有联系的。至于译文形式，因为安世高通晓华语，能将原本意义比较正确地传达出来，所以僧祐称赞它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安世高所译出的佛经大多是关于“禅法”，而应其在《阿毗昙》中，特别说明禅定法数，故曰“善开禅数”，他对中国佛教的传播也是在“禅法”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到后世而得到发展。

道安

(312~385)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俗姓卫，常山扶柳人，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二月（385），年七十四岁。他十二岁出家，后成为佛图澄弟子。他对“般若学”研究最为得力，首次编纂汉译佛经目录，规定僧人以释为姓，制定僧尼轨则，培养了大批学德兼优的弟子。他一生的传法事业，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朝祖琇说：

“法源滥觞之初，由佛图澄而得（道）安，由安而得公（慧远）”。

然而道安不靠佛图澄还是道安，慧远不靠道安则不成为慧远。

道安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时就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于是就转而开始专习佛法。十八岁时出家，（有说年十二出家）。由于容貌黑丑，不被他的老师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劳作，这样从事三年的农活，而他却没有一点怨言。后经再三请求，要佛读经，而且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从而使他的老师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①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还授予佛籍学读，道安天赋俊才，一读就记住了，博得老师的赞许。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石赵的鄆都

^① 具足戒——佛教比丘和比丘尼戒律，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

(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两人一见如故,相论佛道,同议佛籍,道安的敏思捷才,独到见辟,使得佛图澄对他非常赏识,故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

“此人有远见卓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到的。长相虽缺,但学问甚深。”

道安受到佛图澄的器重,因而就从师于他,更加勤勉学习,深究博览,佛道之问,已见功底。不久,佛图澄圆寂。在以后的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说,并且解答了许多佛学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是时慕容氏和石氏激烈交战,石虎即皇帝位(335),内部变乱,道安只得逃离河南鄆都,只身来到山西的藁泽(今临汾县境)去住。藁泽地方很偏僻,可以暂避兵乱之祸,因此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后冒险远集于此,和道安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

道安在藁泽住了不久,又和同学法汰至飞龙山(今河北省涿鹿县境),与僧光等相叙。僧光对于禅定极有研究,是道安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相见之后住下来互相研讨。这时道安已经放弃了“格义”,他和僧光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高僧传·僧光传》里说:

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道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后后?”

从这段争辩来看,说明僧光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却不以为如此,他认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至于先达不先达的可以不必去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所说的“远识”,也可窥见道安的气概和风度。

石虎死后(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石遵在位的时候,曾经慕道安之名,派中使请道安返鄆住华林园,并广修房舍,但为时不久,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天就被杀。道安也就在这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鄆都西北的牵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内弘法,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施教于河北。这时由于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而道安率

领袖众弘法行道，精进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场里面，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因此许多百姓改服从化，信奉佛教。后来成为道安得意弟子的慧远，也就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说道安到了德化，立即派专人请他去讲经说法。安至四十五岁时重回邺都，住受都寺，此间他的门下已集数百人，广为弘法布化。

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冉闵和慕容儁的混战也已基本结束，慕容儁虽在邺都建立了后燕，却不怎么信佛，再加以战乱不息，元气未复，据《高僧传》中记载：‘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人情萧索’。在这种情况下，道安只得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避难，后又因战乱烽烟逼近陆浑县，此时刁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请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来到了新野，他为了广布教化，弘扬佛教，命同学法汰率领弟子四十余人去扬州，法和去四川，自己则亲率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到襄阳。在襄阳时，由于四方学士结集到道安的门下，以致当时所住的白马寺无法容纳，显得狭小了，便将张殷的宅第改建成寺院，取名为“檀溪寺”。由于当地一些富豪的援助，建成了五层塔和四百间房屋。

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道安在那里一住就是十五年，从而得到充分研究佛法，制定僧尼规范，发展弘法事业的机会。据《出三藏记集》中记载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道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深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通明，自安始也。’

再就是创制《众经目录》的事业。中国佛教界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才能承先启后，循着正轨发展。否则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即使后来有了象鸠摩罗什那样的译师，象僧肇那样的大学者，如果没有先前道安的努力，没有《众经目录》的引助，唯恐也会受到障碍和影响的。道安在襄阳，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经。“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

规。道安为此制定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

道安所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已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谢道安书中所云：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随之”。东晋的一些高官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讲经，有的供奉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既使如此，还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等各一尊。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颂扬道安，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的十五年中，各方面都很成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攻占襄阳，苻坚慕道安的名声，想得到他为自己辅政。当苻坚达到目的时，对仆射权翼说：

‘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道公（道安）是一人，习凿齿是半人’。

另据说鸠摩罗什还在本国龟兹时，就闻道安云高德，赞叹他真是东方的圣人，不胜遥致敬礼。道安住在长安五重寺七、八年间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说法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和参加翻译工作。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享年七十四岁。

道安一生中最重要的佛教活动和佛教思想是：

组织翻译，整理和介绍佛教经典。

道安为探究经文的奥秘而注释佛典，他致力于《般若经》的研究，为《光赞般若经》进行注释，写了《光赞折中解》和《光赞抄解》等著作。此外道安还写了其它二十余部注释书应该说道安真是佛典注释之祖。道安在注释佛典的同时，还写了许多经典的序文，以阐述佛典翻译的由来、佛典的题解和自己的见解。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

经论序十四篇、《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等，道安在翻译佛经时，提出译者应注意的事项，即“五失本，三不易”。所谓“五失本”就是将梵语译成汉语时，要有五条失去原文本来面目的事项。所谓“三不易”并不是提出三项翻译上的困难，而是提出三项不可自由更换经文的根据，这些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他所提倡的“起尽之意”，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良贲《仁王经疏》说：

“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

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

道安是我国开始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第一批佛教学者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对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收并容的，其中对“般若学”研究最为精力，其次是对禅学的研究。道安所从尊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他受其师影响，始终注重“禅定止观”的义理，并开创了“本无宗”。从汉到晋，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主要是“禅”和“般若”学体系，他初步融合了这两系的思想，乃成为这两系的集大成者。道安的禅学是“般若”智慧的具体运用，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才能真正体会和得到“般若”，即：“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燄不能伤其虑”，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

道安还很重视戒律，虽然《僧祇律》已由外国传来，并且“受戒

法”也已实行，但尚不完备，便叫其弟子翻译由昙摩持传来的《十诵比丘戒本》及《比丘尼大戒》，并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制定了《僧尼轨范》和《法门请式二十四条》。其内容之一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诵之法，二为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之法，三为布萨差使悔过等之法。还著有《四时礼文》一卷。这是一本礼忏文的什锦集。此外，道安针对当时沙门从师而姓，但所姓各不相同的弊端，他第一个提倡姓释。提出了“大师之本，莫尊释迦”的见解，为此，凡佛门弟子纷纷响应，均以释为姓。

道安为宣传传教，培养弟子，扩大佛教地盘作出了不懈地努力，周武帝在位时，曾先后七次令臣下辩论儒、道、佛三教先后。周武帝的基本国策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对于佛道二教，则企图扬道贬佛。早在公元五六九年，武帝就想确定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为上，因为大家争论不休，未能最终决断。到了次年（公元五七〇年），道安呈上“二教论”，详细评论儒、道、佛三教之优劣，破斥道教十分剧烈。“二教论”把佛教称为“内教”，称此教为练心之术；把儒家称为“外教”，说此教是救形之术，两者虽然都不可缺，但以佛教为高。至于道教，道安则认为是依附于儒家的一个旁枝，十分鄙陋，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周武帝阅后评论道：“初览安（道安）论，通问僚宰，文据卓然，莫敢排斥。”直到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武帝才下令禁止佛教，同时也不得不禁止道教。此时，道安怕遭到不幸，潜逃于山林。周武帝下令搜访，道安被执诣王庭，武帝为了笼络他，亲自相迎，并赐予牙笏，丝帛和官职，但均被道安拒绝。道安是我国东晋时最博学的佛学家。由于他有广博的学问和丰富的文学素养，成为当时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导师，并流传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被社会推崇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时，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想到道安为苻坚所信用，于是共请道安见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苻坚不听，终至败亡。道安在培养弟子，扩大佛教影响方面认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他在华北和襄阳时都有弟子僧众数百人，是当时我国最庞大的僧团。弟